

经济制裁与战争扩散^{*}

游启明

【内容提要】当C借经济制裁施压A结束与B的战争时,为什么A会做出继续战争、扩大战争、停止战争三种不同反应?本文提出C经济制裁的战力削弱度与A战争调整的难易度是影响A做出不同反应的两个主要自变量。当C的经济制裁未削弱A的战力时,A会选择按自身节奏继续推进对B的战争;当C的经济制裁削弱了A的战力而后者也较容易按前者的要求调整对B的战争时,A会选择停火;当C的经济制裁既削弱了A的战力但按C的要求调整对B的战争也很困难时,A会倾向于冒险扩大战争来缓解制裁压力以继续推进对B的战争。本文通过梳理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帝国主义日本在东亚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1956年英法以向埃及发动军事攻击三个案例,验证了所提理论假设的合理性。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对经济方略相关议题的讨论,也提示美国应克制频繁地将经济武器化的战略冲动,以免引发战略意外。

【关键词】 经济制裁 战争扩散 战力削弱度 战争调整难易度

【作者简介】 游启明,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电子邮箱:1989300638@qq.com

*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时代特征、战略风险及中国应对方案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A122)的阶段性成果,系国防科技大学首批“学术新秀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大国战略竞争的污名化策略及其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202401-VJRC-0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崔庭赫博士、赵旌宏博士的有力支持,编辑部老师、两位匿名评审专家也对文章提出了修改建议,笔者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一、引言

当 C 借经济制裁施压 A 结束与 B 的战争时,为什么 A 有时会选择进一步扩大战争?有时会选择继续推进既定战争?而有时则会选择按制裁者的要求停火?回答这些问题具有特定意义。理论上,经济在国家综合实力构成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事实,使经济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成了大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之一。研究经济制裁这一特定形式的经济方略对制止冲突的功用既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经济制裁有关议题的探讨,也有益于将作为低阶政治的经济领域与作为高阶政治的冲突议题进行结合研究。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通过全方位的经济制裁向俄罗斯施压令其结束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鉴于美西方国家的做法与想法都潜在地假设经济制裁对冲突有正面预阻效应,因此在理论上研究经济制裁对制止冲突的影响,有助于评判美方实际战略表现与有关战略设想的正确性。此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掌握着一定的经济权势,研究经济制裁对制止冲突的影响也有助于为中国借经济手段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

现有研究着重讨论了影响经济制裁成功与否的条件,但未讨论当经济制裁失败后可能引发的后果及其出现的原因。即使有学者研究了经济制裁与军事冲突之间的关系,但也未指出影响经济制裁是否会进一步引发冲突扩散及其因果解释机制。借鉴现有研究,本文提出采用经济制裁的战力削弱度与制裁对象调整战争的难易度两个自变量来阐释利用经济制裁制止冲突致使制裁对象做出的不同反应,并通过多个历史案例的结构性比较和过程追踪检验了两个变量的解释效力。

二、既有研究及其评述

经济制裁是指制裁者通过威胁或实际中断制裁对象的对外经贸来施压

后者以满足前者特定政治诉求的行为。从运用领域看,制裁者可利用经济制裁解决从低阶到高阶政治领域的相关问题,如防核扩散、干预内战、维护国际规则、介入战争。从制裁手段来看,经济制裁包括贸易制裁与金融制裁两大类。从运用目的看,经济制裁包括威慑与强制两类,前者指发出经济制裁威胁来施压制裁对象不要做某事,后者则指实际运用经济制裁来强迫后者做或停止做某事。^①当C利用经济制裁施压A使其结束与B的冲突时,表明C正通过实际施加经济制裁压力来强制A。

学者研究了经济制裁的多个议题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第一,经济制裁的成功条件研究。对于该问题,学者的讨论焦点已从单纯地争论经济制裁是否有效转变为研究制裁在什么条件下有效,并从制裁者、制裁对象、制裁目标、制裁双方的关系、制裁形式、第三方因素、制裁实施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影响制裁成功与否的变量。^②对于本文所要探析的经济制裁对制止冲突的影响问题,虽然现有研究对制裁成功促使制裁对象思考停止冲突的有利条件存在讨论,但却没有涉及当经济制裁失败时什么因素会导致制裁对象选择继续或扩大冲突的延展性思考。

第二,对于经济制裁的规范研究。此类研究重视从规范判断的立场评判经济制裁的道义性问题。有学者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相比无所作

^① 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著、王展鹏译:《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179页。

^② 王学玉:《冷战后国际政治重点经济制裁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7期,第44—48页;刘超杰:《国际政治中的制裁研究》,中央党校2006年博士论文;刘建伟:《国际制裁缘何难以奏效—“非故意后果”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第107—123页;朱杰进、胡馨予:《经济成本视角下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3期,第59—86页;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等著、杜涛译:《反思经济制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Johan Galtung, “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With Examples from the Case of Rhodesia,”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3, 1967, pp. 378-416; Robert A. 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2, 1997, pp. 90-136; Jon Hovi et al., “When Do (Imposed) Economic Sanctions Work?” *World Politics*, Vol. 57, No. 4, 2005, pp. 479-499; Dursun Peksen, “When Do Imposed Economic Sanctions Work?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anctions Effectiveness Literature,”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 30, No. 6, 2019, pp. 635-647.

为或倚重具有高风险的军事手段,经济制裁的政策成本较低,是较好的治国之术。^① 有学者则从义务论视角出发,认为经济制裁会给制裁对象的政治稳定、民主发展进程、性别关系以及人权状况等方面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并不是好的政策工具。^② 本文倾向于从实证层面讨论经济制裁施压对结束冲突的影响,并非侧重对经济制裁的规范性评价。

第三,经济制裁与军事冲突的关系研究。对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研究思路。

一是替代论。此观点认为经济制裁借助两种作用机制能够有效替代军事手段。首先,信号路径。因为发起经济制裁表明制裁者愿意承担因中断与制裁对象的经贸联系而产生的成本,这就向制裁对象发送了对其相关行为不满的可信信号,有助于使后者在了解制裁者之决心的基础上为避免更激烈的对抗而选择让步。^③ 其次,实力削弱路径。此类研究认为,制裁者可利用经济制裁来有效削弱被制裁者的实力从而向后者强加自身的意志,这能够避免利用军事打击这种成本较高的博弈手段来胁迫对手。比如,丹尼

^① Charles H. Blake and Noah Klemm, "Reconside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n Examination of Selection Bia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3, No. 2, 2006, pp. 133-169; 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New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② 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24—48页;Allen Susan Hannah, "The Domestic Political Cos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6, 2008, pp. 916-944; Dursun Peksen, "Better or Worse? The Effe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6, No. 1, 2009, pp. 59-77; Dursun Pekse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Human Security: The Public Health Effe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7, No. 3, 2011, pp. 237-251; Allen S. Hannah and David J. Lektzian, "Economic Sanctions: A Blunt Instrumen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0, No. 1, 2013, pp. 121-135.

^③ Lance Davis and Stanley Engerman, "Sanctions: Neither War Nor Pea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7, No. 2, 2003, pp. 187-197; David J. Lektzian and Christopher M. Sprecher, "Sanctions, Signals,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 No. 2, 2007, pp. 415-431; Hyung Min Kim,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anctions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 Focusing on Reciprocal Causation,"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 31, No. 5, 2021, pp. 532-549.

尔·麦考克(Daniel McCormack)等认为,在权力转移背景下,出现相对衰落的一方可利用经济制裁来预防性打击崛起国。^① 研究经济遏制议题的学者也不同程度地认为经济制裁是种能够替代军事手段的有效制衡方式。^② 鉴于现实中存在借经济制裁制止冲突却引发了冲突扩散、持续与结束三种不同结果的现象,说明替代论还无法有效解释经济制裁制止冲突的不同效果。

二是刺激论。此类观点认为经济制裁会进一步引发军事冲突。首先,当C对A发起经济制裁后,C就向国内外投入了观众成本,如果不取得一定的政策成果将会使自身蒙受信誉损失。在此种压力作用下,一旦A拒绝了C的制裁要求,C选择军事手段迫使A屈服的几率就会增高。比如,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指出,当A认为会与C持续处在竞争关系时,A将不会屈服于C的制裁压力,此时两者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将增高。^③ 其次,有研究指出,当C向A发起经济制裁后,第三方B可能借机对A发起机会主义的军事挑衅,因为B不但会把C的经济制裁举动视作不会干预甚至支持其军事挑衅的信号,而且还会认为C的经济制裁将会削弱A的实力,从而为其军事挑衅A创造了有利条件。^④ 与以上两类研究不同,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当C向A施加经济制裁压力要求其停止同B的冲突时,什么因素

^① Daniel McCormack and Henry Pascoe, "Sanctions and Preventive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8, 2017, pp. 1711-1739.

^② Michael Mastanduno, "Strategies of Economic Containment: US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Vol. 37, No. 4, 1985, pp. 503-531; Dong Jung Kim, "Economic Containment As a Strateg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6, 2019, pp. 1423-1444.

^③ Daniel W. Drezner, "Conflict Expectations and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4, 1998, pp. 709-731.

^④ Cooper A. Drury and Johann Park, "Mids,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rade: the Effect of Economic Coercion on Military Disputes,"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 March 18, 2004; Peterson M. Timothy and Cooper A. Drury, "Sanctioning Violence: The Effect of Third-Party Economic Coercion on Militarize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5, No. 4, 2011, pp. 580-605; Peterson M. Timothy, "Reconsidering Economic Leverage and Vulnerability: Trade Ties, Sanction Threats,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Coerc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7, No. 4, 2020, pp. 409-429.

会促使 A 选择结束、继续或扩大冲突,而非在何种情况下 C 会进一步通过军事手段来施压 A,或者何时第三方会利用 C 对 A 的经济制裁来趁机对 A 发起军事挑衅。最后,面对经济制裁的施压,A 可能会进行军事反扑。戴尔·卡普兰(Dale C. Copeland)在研究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在 A 对 C 形成了非对称经济依赖的情况下,一旦 A 形成了 C 会关闭自身经济发展之外部通道的预期时,就可能会利用战争来谋求自身的经济安全。^①虽然利用卡普兰的理论能推论出在 C 的经济制裁在对 A 施加了较大伤害的情况下 A 可能会做出扩大战争的举动,但他将 A 发起战争的动机归于经济发展,忽视了 A 为什么在承受较大经济制裁的施压下还难以按 C 的要求调整既定行为的更多原因。

三是细化研究。此类研究将经济制裁所要实现的目的进行了分类以试图细化研究经济制裁的不同效用。首先,经济制裁对战争的威慑效用。这类研究主要讨论了威胁性经济制裁预防冲突的问题,讨论 C 所发出的经济制裁威胁是否能够有效威慑住 A 可能要发起的战争行为。^②比如,夏立平等指出,由于中断贸易会造成经济成本损失,因此经济制裁威胁可成为威慑战争的有效手段。^③金东荣(Dong Jung Kim)建议,鉴于中断经济联系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等成本,国家可有意借强化经济接触来威慑对方的威胁性举动。^④伊万娜·佩特雷斯库(Ioana M. Petrescu)则指出,制裁处在军事冲突中的国家能成功威慑其不参与下一次冲突。^⑤这类研究主要关注未实施的经济制裁威胁的防战作用,与本文所要探讨的通过实施制裁来止战的问题不

^①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5-41; 戴尔·科普兰著、金宝译:《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 周方舟:《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研究》,外交学院 2020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 夏立平、祝宇雷:《贸易何以成为威慑手段?》,载《东北亚论坛》,2019 年第 6 期;夏立平、祝宇雷:《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载《美国研究》,2020 年第 1 期。作者将特朗普政府为施压中国放弃“中国制造 2025”政策以及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或制度所施加的经济制裁举措也视作贸易威慑,可能混淆了强制或威慑的区别。

^④ Dong Jung Kim, "Economic Deterrence Through Economic Engagemen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5, No. 2, 2019, pp. 176-186.

^⑤ Ioana M. Petrescu, "Rethinking Economic Sanction Success: Sanctions as Deterrent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010, pp. 1-41.

同。此外,此类研究表现出了“制裁的天真理论”^①倾向,认为经济制裁能无条件地劝阻战争爆发,忽视了威慑与强制行为的关系性特征,忽略了“经济胁迫的结果不只是胁迫者压力的产物,还取决于被胁迫者的想法。”^②其次,经济制裁的止战效用。此类研究主要讨论了威胁性或已实施的经济制裁对已发生的冲突或战争的制止作用。一方面,有学者借助案例梳理、统计研究等方法讨论了经济制裁对阻止国家间战争的效用问题。伊丽莎白·罗杰斯(Elizabeth S. Rogers)通过梳理相关案例后认为,经济制裁虽有利于预防、管控冲突,但对解决冲突的作用不大。^③此类研究不仅忽视了冲突第三方C利用经济制裁解决A和B双方的冲突的案例,如美国借经济制裁向英国施压使其退出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也未给出经济制裁为何对干预冲突起到不同效果的原因。迈克尔·艾里克森(Mikael Eriksson)等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联合国所发起的经济制裁能有效制止冲突(包括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冲突),但并未讨论条件是什么,而是呼吁学界加强对此进一步探究。^④另一方面,有研究讨论了经济制裁对预防、阻止内战或族群冲突的影响。此类研究主要借鉴了战争的谈判模型,认为冲突双方对相对实力与竞争决心的不同认知以及对彼此遵守和平解决矛盾的谈判协议的怀疑,是导致内战或族群冲突爆发的两个重要原因,而冲突第三方则可以通过实施或威胁施加经济制裁来传递维护谈判协议的信号,削弱冲突一方的战斗实力和决心,从而预防或制止冲突。^⑤尽管这类研究聚焦于经济制裁预防、阻

① Johan Galtung, “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With Examples from the Case of Rhodesia,” p. 388.

② Moon Phoebe WooRim, *When the Target Fights Back: Economic Coercion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in the Era of Global Value Chains*, Ph. D dissertation, UC Irvine, 2022, p. 46.

③ Elizabeth S. Rogers, “Using Economic Sanctions to Control Regional Conflicts,”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4, 1996, pp. 43-72.

④ Mikael Eriksson and Peter Wallensteen, “Targeting Sanctions and Ending Armed Conflicts: First Steps Towards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1, No. 6, 2015, pp. 1387-1398.

⑤ Abel Escribà-Folch,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Civil Conflic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2, 2010, pp. 129-141; David Lektzian and Patrick M Regan, “Economic Sanction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and Civil Conflict Outcom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3, No. 4, 2016, pp. 554-568.

止内战或族群冲突问题,并未对经济制裁阻止国家间战争等话题进行讨论,但是它指出了经济制裁可通过削弱制裁对象的实力来制止战争这一重要作用机制,可此类研究依然未详细讨论经济制裁削弱冲突方实力的机制及其成功的条件,而且也没有详细讨论制裁对象在面对经济制裁施压时的具体抉择及其考量问题。

三、战力削弱度、战争调整难易度与制裁对象的回应

战争是种运用暴力手段将己方意愿强加给对方的政治行为,本质上是种战争双方能力与意志双重对抗的互动。^① C 运用经济制裁施压 A 令其结束与 B 的战争的战略构想是:借助制裁施压来改变 A 的战争能力与意志,从而迫使其按己方要求停止对 B 的战争。本部分将指出,C 实施经济制裁的战力削弱度以及 A 在制裁施压下调整战争的难易度是影响冲突中制裁对象如何回应经济制裁施压的两个主要自变量。

(一) 经济制裁的战力削弱度与制裁对象的回应

国家是在特定战略环境下行动的行为体。当环境改变时就需重新评估自身的战略处境以拟定下一步行动。^② 在实力上高于对手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当冲突中的国家面对新的实力对比现状时,就需要重新评估战争环境以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③ 经济制裁则是借打击制裁对象的经济实力来削弱其战力的一种手段。

经济实力是国家战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军事实力依赖于国家总体财富。只有将“经济蛋糕”做大才能持续而稳固地为国防建设投入资源。因此“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

^①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时殷弘译:《战争论》,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101—123 页。

^②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1—179 页。

^③ 杰弗里·布莱内著、时殷弘译:《战争的原因》,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9—22 页。

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①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从经济角度将霸权定义为“在控制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②的国家那样,具备世界前列的经济实力是成长为军事强国的必要条件。其次,经济发展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资料、劳动制度等多方面进步的过程,对提升国家军事实力具有正外部性。比如,高效地获取石油、铁、粮食等战略性经济原料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物资的供应安全;“先进的经济和科学基础是采用先进军事技术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前提”;^③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则为培养高质量战斗人员创造了基础;经济发展能为执政党在国内创造绩效合法性从而为其动员军事资源创造有利的内部政治环境。

经济制裁试图通过两种效应来削弱制裁对象的经济实力从而弱化其战力。第一,供给效应。经济制裁通过管控制裁对象技术、市场、规则、原材料、资金等经济发展所要素的外部供给,使后者因不能获取足够的发展资源而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这既能间接使制裁对象无法为战争与国防建设持续投入充足资源,也直接使其无法获取开展战争所需的战略物资与技术。^④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北方联邦对南方邦联的重要出口品棉花进行了封锁,意图迫使后者因无法获取战争所需外汇而投降。一战与二战中英国也对德国进行了全方位的经济封锁,试图通过全面的“经济绞杀”来削弱德国的战斗力。

第二,挤压效应。当经济制裁从外部管控了制裁对象经济发展所需要

^① 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 XVIII。

^②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③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等译、乔娅校:《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④ Rawi Abdelal and Jonathan Kirshner, “Strategy,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Defini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1-2, 1999, pp. 119-156; Dong Jung Kim, “Economic Containment as A Strateg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6, 2019, pp. 1423-1441; 肖河、潘蓉:《大国经济竞争策略的选择机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4期,第1—40页。

素的供给时,会迫使它重新调整国内经济资源的投入模式,将具有比较优势生产部门的要素投入到因进出口管控而缺乏发展要素的比较劣势的生产部门,引发经济低效发展,从而在削弱制裁对象现存资源利用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其可投入战争进程的资源总量。^①此外,当外部发展资源因经济制裁受到管控后,为满足国内民众对“黄油”的需求以避免内乱,制裁对象需要将原本投入“大炮”建设的资源转投至民用领域,这会扰乱既有国防建设布局从而影响其战力。^②当然,面对因经济制裁而持续下降的社会生活水平,民众也可能会对执政党失去信心与信任,从而影响政府的国防动员力。美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对英国实施的经济制裁加剧了后者的石油短缺,催生了其国内高通货膨胀率。在此背景下,国内民众对英国政府的战争行为进行了抗议,最终影响到了罗伯特·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政府的战争决心。

经济制裁能否成功削弱制裁对象的战力是有条件的。第一,制裁对象的经济脆弱性。^③一方面,这种脆弱性来源于制裁对象对外部经贸体系的依赖度。只有当制裁对象的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对外依赖度时,才会较容易受到经济制裁的消极影响。比如,一国的石油、铁、粮食等高度依赖进口会导致其很容易因经济制裁而引发资源供给危机;一国重要商品依赖出口则会使其很容易因外部市场的关闭而影响外汇收入。相反,当一国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自给自足水平时,它经济发展的外向性就不会太高,主要依靠本国市场来动员经济发展要素、推动自身发展,此时外界制裁将难以对其施加太大的消极伤害。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指出,具有州级规模的大国会拥有较丰富的资源与较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得以自成一个

^① Timothy C. Lehmann, “Keeping Friends Close and Enemies Closer: Classical Realist Statecraft and Economic Exchange in U. S. Interwar Strategy,”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1, 2009, pp. 122-123.

^② Dong Jung Kim, “Economic Deterrence Through Economic Engagement,” pp. 176-186.

^③ Elena V. McLean and Taehee Whang, “Friends or Foe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2, 2010, pp. 427-447.

相对自足的经济系统,不太容易受到外界经济制裁施压的过大影响。^① 另一方面,即使制裁对象的经济具有较高的对外依赖度,但是当这种依赖不是特别地指向制裁者时,后者也无法利用经济制裁来严重削弱其经济实力与战力。^② 因为,当 A 的经济不是对 C 及其盟伴,而是对其他国家或者是对包括 C 在内的范围广泛的国家与地区形成了非对称依赖时,尽管 A 的经济发展会受外部环境变化的较大影响,但因为有众多贸易伙伴,所以外贸的替代弹性比较高,即使受到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经济制裁,也可以寻找到潜在的“黑骑士”来缓解制裁压力。^③ 所以,只有当制裁对象的经济具有较高的对外依赖度,且这种依赖的对象指向制裁者时,后者的经济制裁才能对其战力产生较为消极的削弱性效果。^④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由于日本的石油进口度极高,而且其中约 90% 的进口来源于美国,因此美国的石油禁运就对日本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第三,制裁者的经济制裁执行力。能够准确评估并及时利用制裁对象对制裁者的经济依赖是成功借经济制裁严重削弱制裁对象战力的前提。意大利侵入埃塞俄比亚后,英法在制裁意大利时不但忽略了后者货币正处于脆弱地位的现实,错失了制裁机会,而且在意大利对石油进口具有巨大需求的情况下也并未将其列入制裁名单,这使意大利的战争实力并未受到英法发起的经济制裁的较大影响。即使正确识别并利用了制裁对象的经济脆弱之处,维持制裁者相关方的制裁共识也是确保经济制裁能顺利实施从而成

^① Michael Mastanduno, “Strategies of Economic Containment: U. S.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Vol. 37, No. 4, 1985, pp. 514-524.

^② Daniel McCormack and Henry Pascoe, “Sanctions and Preventive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8, 2017, pp. 1711-1739.

^③ Bryan R. Early and Robert Spice,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anctions Busters: When Does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Help Sanctioning Effort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1, No. 3, 2015, pp. 339-360; Jin Mun Jeong, “Sanctions-Busting, Material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7, No. 4, 2023, pp. 1904-1929.

^④ 池志培、刘建伟:《经济制裁结束的政治逻辑》,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 年第 4 期,第 93—100 页。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潜在假设,即当 C 对 A 形成非对称经济依赖时,C 制裁 A 给自身所带来的相对成本将比 A 还要高,此时 C 不太可能会制裁 A,即使施加了制裁也将会对 A 缺乏伤害效力。

功削弱制裁对象战力的重要条件。^①当美国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后,日本传统的石油供应国英国、荷兰也在美国建议下加入了禁运行列,致使日本基本失去了石油进口渠道。当美国借谷物禁运施压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时,尽管后者确实在短期内加大了对谷物进口的给付额,但由于美国内部农场主的反对以及阿根廷、巴西等国漠视美国的联合禁运建议,美国的谷物禁运并未给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造成过大的消极影响,最终里根政府取消了谷物禁运。

C对A发起的经济制裁的战力削弱度会如何影响后者与B的战争?当C的经济制裁并未严重削弱A的战力时,A会选择忽视制裁施压,继续按自身节奏推进同B的战争,因为此时A所面对的战争环境并未因C的经济制裁而发生重大改变,也就不需要重新评估自己因经济制裁施压所面临的新的战争环境以决定下一步的战争行动。^②

当C的经济制裁严重削弱了A的战力时,A会选择如何回应?鉴于A不可能在战力遭致C方经济制裁的持续削弱后还无动于衷地继续维持既定的对B战争进程以“坐等耗亡”,因此A将会面临两种抉择:要么屈服于C的经济制裁施压,按它的要求停止同B的战争;要么冒险扩大战争范围,从他处弥补因经济制裁所遭受的损失,以在减轻制裁施压的同时继续推进同B的战争。^③

(二) 战争调整难易度与制裁对象的回应

当C的经济制裁严重削弱了A的战力后,什么因素会进一步减弱A与

^① 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Statecraft,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gendas for Research,”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1-2, 1999, pp. 288-316; Whang Taehee, “Structural Estima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From Initiation to Outcom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5, 2010, pp. 561-573.

^② 这里只是表明C的经济制裁施压不会被纳入A的战争决策框架,而不是说A不需要根据与B的战争环境的变化来调整下一步战争行动。

^③ 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下,再通过扩大战争来寻求缓解自身所面临的经济制裁压力,看似有违直觉,因为这等于是给自己主动增加新的敌人。但是,当A无法按照C的要求停止与B的战争以换取经济制裁的取消时,为补充继续战争所需的资源,有时扩大战争也会成为必要的理性选择。

B 继续战斗的意志从而促使其按 C 的要求停火？什么因素则会维持或进一步刺激 A 继续同 B 作战的战斗意志，进而推动其冒险选择通过扩大战争的方式来应对 C 的经济制裁施压？

国家不会轻易“谋杀”，“除非它们被剥夺任何出路。”^①运用经济制裁强制停战的做法在本质上是种谈判策略：利用制裁施压为 A 提供一个政策选择，即胁迫 A 按 C 的要求停止对 B 的战争来换取经济制裁的取消。所以，面对经济制裁的施压，A 按 C 的要求调整对 B 的战争的难易度就成为影响其战斗意志与不同回应方式的重要变量。当按 C 的要求停止对 B 的战争比较容易时，A 可能选择以停战方式来换取制裁的取消以缓解自身所承受的制裁施压。相反，当 A 无法轻易按 C 的要求调整同 B 的战争时，它就会冒险选择通过扩大战争的方式来减轻 C 所施加的经济制裁压力以继续维持、推进对 B 的战争。

三个因素会影响身处制裁压力下的 A 按 C 的要求调整对 B 的战争的难易度。第一，成本收益算计。谈判是种交换，保持放弃与所得的平衡是确保交换成功的前提之一。^② 只有当 A 认为按要求停止同 B 的战争所引发的成本不高于 C 取消经济制裁所带来的收益时，才会选择停战，反之则不会。比如，当 A 认为自己一旦按要求停止对 B 的战争，后者将会持续提升相对实力并攻击自己，那么 A 将宁愿在此时继续设法维持战争也不会妥协。^③ 日本之所以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施压也不愿意妥协，是因为它认为一旦放弃在东亚的战争，苏联、中国将会持续崛起从而危及自身的帝国生存，所以日本选择了扩大战争规模以维持既定战争的战略赌博。

三个变量会影响 A 对交换平衡性的评估。一是交换的前提是能将自身利益进行分割，通过舍弃部分利益来赢取他者的利益交换。如果 A 认为对 B 的战争所涉及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话，那么此种全有或全无的战略认知会

^①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齐皓译：《李德·哈特与历史之重》，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68 页。

^② Harrision R. Wagn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argaining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98, pp. 461-483.

^③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pp. 5-41.

使其无法放弃战争来换取经济制裁的取消。^① 二是前景理论认为,国家对损失的敏感度高于收益且愿意在面临损失的评估下冒险行动。^② 随着对 B 战争的推进,A 投入的物质、人员、声誉等沉没成本也会催生出相应的战争利益。面对 C 借经济制裁迫使 A 停止对 B 战争的胁迫举动,如果在进行战略算计时将已投入的战争成本以及所要放弃的战略利益框定为损失,那么 A 就会产生得不偿失的战略心理从而倾向于选择进一步冒险来维持甚至推进对 B 的战争进程。三是停止战争所需放弃利益的重要性。战争是种出于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政治行动。当作为制裁对象的 A 方认为按 C 方的要求停止正在对 B 进行的战争所需放弃的利益会危及到自身的核心利益时,也会倾向于通过冒险扩大战争的方式来规避 C 方经济制裁所施加的压力。^③

第二,对 C 所施加的经济制裁的可调节性的评估。当 C 借经济制裁强制 A 停止对 B 的战争时,就潜在地向 A 传递出一个谈判信号:按要求停止战争等于制裁的取消,继续战争则等于制裁的持续。如果 A 认为 C 所施加的经济制裁是可调节的,那么它就可以考虑按 C 的要求来停止战争以换取制裁的取消。但当 A 认为不管如何行为 C 都不会调整经济制裁政策时,此时制裁在 A 的战争决策中会成为一个常量,A 将寻求抵制经济制裁施压的办法而不是寻求改变制裁的出路。^④

①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1995, pp. 379-414; Stacie E. Goddard, “Uncommon Ground: Indivisible Terri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0, No. 1, 2006, pp. 35-68.

② Gary Schaub Jr., “Deterrence Compellence and Prospect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5, No. 3, 2004, pp. 389-411.

③ 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第37—38页;朱杰进、胡馨予:《经济成本视角下经济制裁的有效性》,第64—69页;Robert A. 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p. 109; Jean-Marc F. Blanchard and Norrin M. Ripsman,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 When do Economic Sanctions Work Best?,”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1-2, 1999, pp. 219-253; Clifton T. Morgan and Valerie L. Schwebach, “Fools Suffer Gladly: The Use of Economic Sa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2, 1997, pp. 27-50.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Trade Technology and Leverage: Economic Diplomacy,” *Foreign Policy*, No. 32, 1978, pp. 63-80.

对 C 方意图的感知是影响 A 评估经济制裁可调节性的一个重要变量。当对 C 的意图认知是积极的, A 会相信 C 的经济制裁也是可调节的, 并愿意考量是否选择按 C 的要求来调整对 B 的战争, 因为此时 A 明白调整对 B 的战争将有利于减轻来自 C 的制裁压力。相反, 当对 C 的意图认知持消极评价时, A 会认为 C 的经济制裁是不可调节的, 并产生自身经济发展机会已被 C 永久阻断的消极预期,^① 此时 A 将不愿按 C 的要求做出调整, 因为 A 会认为不管如何行动 C 所施加的制裁压力都会持续下去, 所以与其接受自身实力被持续削弱的未来, 不如现在通过扩大战争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制裁施压。^② 比如, 当 A 将 C 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或敌对者时, 它不仅不会相信 C 会取消经济制裁, 还会认为经济制裁是 C 发起军事或其他更强烈度施压行动的前兆。^③ 因此, 此时接受 C 的经济制裁施压来停止对 B 的战争, 不但会传递出自身竞争意志薄弱的信号, 引发 C 单独或联合包括 B 在内的他者的进一步打压, 而且还会因退步而削弱自身将来面对 BC 的竞争实力与信誉,^④ 所以“预期到与大国战略竞争对手的长期竞争后, 具有依赖性的国家会有更强动力猎取他国。”^⑤ 而当 A 将 C 视作朋友或伙伴时, A 会认为自己是在同值得信任的国家谈判, 因此不会担忧因调整对 B 的战争而显得软弱。

第三, 国内政治变量。对外政策是国际国内相联动的“双层博弈”的产物,^⑥

① Peterson M. Timothy, “Dyadic Trade, Exit Costs,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8, No. 4, 2014, pp. 561-591.

② Daniel W. Drezner, “The Hidden Hand of Economic Coerc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3, 2003, pp. 643-659.

③ Todd S. Sechser, “Reputations and Signaling in Coercive Bargain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2, No. 2, 2018, pp. 318-345.

④ Todd S. Sechser, “Goliath’s Curse: Coercive Threats and Asymmetr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4, 2010, pp. 627-660; Navin A. Bapat and Bo Ram Kwon, “When Are Sanctions Effective? A Bargaining and Enforcement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9, No. 1, 2015, pp. 131-162.

⑤ Peter Liberman,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1-2, 1999, p. 64.

⑥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98, pp. 427-460.

国内政治不仅会影响对外政策的实施速度,还会作用于其方向。^①“在危急时刻,如果执政者认为自己的地位是脆弱的,他将会从护持政治地位出发进行决策。”^②面对C借经济制裁所施加的停止对B的战争的压力,只有赢得国内有关政治势力的同意,A方执政者才会考量是否按C的要求行事。当国内对按C的要求进行调整的反对力量很强时,为避免调整对B的战争将危及自身执政地位或搅乱国内政局,A方执政者将不会做出调整,并会冒险克服外界压力来进一步维持甚至推进对B的战争。^③执政者前期的战争动员策略也会影响后期在面对压力时进行战争调整的难易度。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指出,当执政者为维持、提升党派或个人利益而借传播“自我围困”威胁、“纸老虎”意象等“帝国迷思”来进行战争动员后,大国会很容易在遇到战争压力时通过扩大战争的冒险行动来克服其困境。^④珍珠港事件前,日本国内广泛表现出的帝国追求狂热与军国主义癫狂,阻挠了日本执政者在面对美国施加的经济制裁压力时对东亚战争的调整,使其不顾一切地走向了通过扩大战争来回应美国经济制裁施压的道路。

(三) 理论假设小结

综合上述推理可将本文的研究假设总结如下:在面对C借经济制裁向A施压使其停止对B的战争时,A的回应方式受经济制裁对自身战力削弱度以及按C的要求调整对B的战争的难易度两个变量影响。

假设1:当经济制裁未削弱战力时,A将会选择按自身节奏继续推进对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4, 2004, pp. 159-201.

^② Norrin M. Ripsman and JeanMarc F. Blanchard, “Commercial Liberalism under Fire: Evidence from 1914 and 1936,”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2, 1996, p. 6.

^③ Elena V. McLean and Mitchell T Radtke, “Political Relations, Leader Stability, and Economic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62, No. 2, 2018, pp. 357-370; Jin Mun Jeong and Dursun Peksen,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Veto Players, and Sanction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3, No. 1, 2019, pp. 194-217.

^④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9页。

B 的战争。

假设 2: 当经济制裁削弱了 A 的战力,且按 C 的要求调整对 B 的战争较容易时,A 将会选择接受 C 的要求停止对 B 的战争。

假设 3: 当经济制裁削弱了 A 的战力,但按 C 的要求调整对 B 的战争很困难时,A 将会选择通过扩大战争的冒险方式来应对 C 的经济制裁施压,维持甚至推进对 B 的战争。^①

四、比较案例检验

本部分将借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及苏伊士运河战争三个案例来检验前文所提理论假设。选取这三个案例的原因在于三个案例中的自变量呈现出不同的取值变化:英法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并未对意方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实力造成较大消极影响;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日本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不愿意按美方要求进行调整;美国对英国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经济制裁对英国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而英国的战争立场也比较灵活。由此,可对三个案例进行结构性比较的同时,对每个案例进行过程追踪,以检验自变量的变化是否通过本文所提及的作用机制对因变量(制裁对象的回应方式)产生了相对应的影响。^②

(一) 国联制裁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

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执政的意大利借 1934 年 12 月 5 日与埃塞俄比亚爆发的瓦尔瓦尔边界纠纷之由,于 1935 年 10 月 5 日发动了侵埃战争。意方此举不仅明显违反了它作为国联会员国需遵守的第 12、13 与 15 条盟约,悍然运用武力侵犯了其他会员国,还违背了自己签订的承诺放弃非法战争的《非战公约》,对一战后构建的凡尔赛国际秩序造成

^① 文章不考虑经济制裁未削弱战力而 A 较容易按 C 的要求调整对 B 的战争这一情境,因为此时经济制裁施压将不是 A 进行战争考量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因素,它会综合经济制裁施压之外的因素来做出对 B 的战争决策。

^② John Gerring, "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2, 2004, pp. 341-354.

了公然挑衅。所以,当埃塞俄比亚求助于国联后,作为国联以及凡尔赛秩序主要领导者的英法两国联合其他国家对意大利发起了“三心二意”的经济制裁。^①

一方面,英法等国对意大利发起了经济制裁。1935年10月7日,国联行政院发表声明将意大利定义为侵略者,10月11日国联组建制裁意大利的协调委员会并下设由18国组成的制裁委员会,10月12—19日国联先后通过了对意大利实施武器禁运、财政制裁、禁止进口意大利货物、禁止向意大利出口锡橡胶铝铁矿等物品的制裁决议,11月8日制裁决议正式生效并实施。^②

另一方面,英法对经济制裁的范围进行了限制。一是未对意大利实施石油制裁。意大利的侵埃战争是典型的工业国对非工业国的战争,意方向战场投入了600多辆坦克、150多架飞机,战争对石油的需求十分旺盛。由于意大利自身不生产原油而主要依赖进口,据估计其石油储备只够维持三个月的侵埃战争,因此意方在战争开始后对可能遭致外界的石油制裁十分敏感。墨索里尼本人承认:“如果国联……将经济制裁领域扩大到石油领域,那么我将不得不在一个月内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撤军——这对我将是不可估量的打击。”^③然而,英法不但没有认真考虑过对意大利实施石油禁运,而且还阻挠国联做出禁运的努力。^④

二是英法没有利用意大利当时的货币窘境,通过施加金融制裁来强制其结束侵埃战争。1926年8月8日墨索里尼在佩萨罗发表演讲,将自己政权的稳固与意大利货币里拉的币值坚挺联系在一起。鉴于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及意大利经济不景气的现实,因此里拉贬值是客观需要。但墨索里尼不仅选择不贬值还动用国家外汇维持并拉升了里拉币值。1927年1英镑

^① 袁道丰:《意阿战争与国联制裁》,载《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1936年第2期,第11—20页。

^② 陈祥超:《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始末》,载《西亚非洲》,1985年第5期,第45—55页。

^③ 乔纳森·科什纳著、李巍译:《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48页。

^④ 梁占军:《意埃战争爆发后法英在对意制裁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28—136页。

价值 92 里拉,1 美元价值 19 里拉。到 1935 年 1 英镑只值 58 里拉,1 美元只值 12 里拉。这种强行维持并推高里拉币值的做法导致在 1934 年 1—12 月意大利的外汇储备从 73.97 亿里拉缩减至 30.27 亿, 仅略高于安全储备金率。准备并实施侵埃战争进一步消耗了意大利的外汇储备。备战前三个月消耗了 10 亿里拉, 战前一个月消耗了 25 亿里拉。1935 年 10 月意大利公布外汇余额为 39.36 亿里拉, 到年底则为 30.27 亿里拉, 这导致意大利国内经济专家预计外汇的逐步减少将会带来经济萧条。可是, 英法并未利用两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向意大利施加金融制裁的压力以强制其停止侵埃战争。^①

英法选择经济制裁意大利主要是因为, 作为一战后国联与凡尔赛秩序的主要领导者, 面对意大利公然违背秩序规则、侵犯他国的行为, 为展现自身信誉并稳定小国对一战后所创国际秩序的信心, 英法必须作出回应。此外, 两国内部政治形势也要求作出回应。在 1935 年 6 月 27 日面向 1155 万英国人做的一次调查中, 1109 万人支持英国继续留在国联, 1102 万人支持运用经济制裁应对一国对另一国的进攻。^② 对法国而言,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具有重要国内政治影响力的新左派力量也倾向于积极履行国联义务, 因此法国领导者担忧不参与经济制裁意大利的进程的话将可能会引发国内动乱。^③

而英法有意限制对意大利经济制裁范围的原因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方面, 政治因素、国内因素、战略考量与集体制裁的“合作困难”所引发的制裁发起与执行困境, 导致英法未对意大利实施石油禁运。政治因素。一战后的欧洲存在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三大竞争性意识形态。意大利虽在墨索里尼的煽动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拥抱了法西斯主义, 但国内一直存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势力。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与偏执, 英法担忧石油禁运可能会使墨索里尼在国内失势从而使意大利变为“红色”, 因此不敢将

^① 乔纳森·科什纳著、李巍译:《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第 246—252 页。

^② R. A. C. Parker,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the Ethiopian Crisis 1935—1936,”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89, No. 351, 1974, p. 299.

^③ 沈志远:《世界各国对意埃战争的态度》, 载《世界知识》, 1936 年第 5 卷, 第 287—288 页。

石油纳入制裁名单。^①

国内与战略考量。20世纪30年代英法的战略焦点是德国,两国将后者视作潜在的最大敌人,在一战造成的国力损伤以及国内和平主义氛围的影响下,两国都认为要制衡德国就需要将意大利拉入己方阵营。对意大利的战略需求使英法不愿在侵埃战争中过多刺激意大利,因为两国既“禁不住同意大利争吵并把它赶到德国怀抱”,^②也害怕石油禁运会导致与意大利的战争。早在1935年1月英国外交大臣霍尔(Samuel John Gurney Hoare)就预料到意大利会对埃塞俄比亚动武,他对此给出的英国应对原则是:“以一种不会消极影响英意关系的方式处理该问题。”^③法国外长赖伐尔(Pierre Laval)直言:“我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石油禁运),因为在我看来,实施这个措施将把我们拖入战争,而我们希望避免战争。”^④另外,两国内部也存在反对过于强硬制裁意大利的声音。比如,在战争爆发当天英国军方就上书内阁反对任何形式的对意经济制裁以防给英国再增加个敌人。^⑤当预感意大利即将对埃开战后,法国《时报》在1935年10月3日发表社论,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法国都不能拖进针对意大利的武力行动中。”^⑥

集体制裁的“合作困难”。英国认为如果实施禁运就得承担对意大利的战争风险,而为赢得战争则需要得到法国在地中海的军事帮助,但英国认为法国并不具备战争能力,也不相信法国会放弃联意制德的需要,所以英国在石油禁运问题上采取了“绝不比法国积极”的立场。^⑦对法国来说,同英国合作对意大利实施石油禁运的前提是后者能明确提供帮助自己制衡德国威胁

① George W. Baer, “Sanctions and Security: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Italian-Ethiopian War, 1935—193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7, No. 2, 1973, pp. 165-179.

② 齐世荣:《试析意埃战争前夕英国的“双重政策”》,第5页。

③ 乔纳森·科什纳著、李巍译:《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第252页。

④ Rene de Chambrun, *Pierre Laval: Traitor or Patriot?*, Farmington: Scribner, 1984, p. 33.

⑤ James C. Robertson, “The Origins of British Opposition to Mussolini over Ethiopia,”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9, No. 1, 1969, p. 130.

⑥ 梁占军:《意埃战争爆发后法英在对意制裁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第128页。

⑦ Nicholas Rostow and Alexander Kleibrink, *Anglo-French Relations 1934—36*,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p. 204.

的安全保证,但鉴于英国背着法国同德国签订海军协定等一系列对德绥靖举动,因此法国不相信英国会提供明确的安全保证,所以不愿放弃联意制德的既定方针。^① 此外,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美国未加入国联,而且其占意大利的石油进口比例还从 1935 年 1—9 月的 6.3% 上升至 10—12 月的 17.8%,这也使英法不愿承担石油禁运所可能引发的风险。^②

另一方面,在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看来,英法之所以没有利用意大利脆弱的货币状况借金融制裁使其停止侵埃战争,是因为两国并未意识到存在货币强制的机会。^③ 当然,即使意识到机会,由于在石油禁运议题上所存在的政治、战略、国内反对、集体制裁的挑战等困难,英法也很可能不会对意大利实施金融制裁。

最终,英法所施加的“三心二意”的经济制裁只给意大利造成了轻微影响,使得制裁未能阻止意大利的侵埃进程。意大利的出口额虽从 1934 年 12 月的 4.85 亿里拉下降至 1936 年 2 月的 2.6 亿里拉,但由于制裁参与国数量的减少,从 1936 年 3 月开始意大利的出口额开始回升。^④ 尽管意大利矿产资源匮乏,但由于战前储备、制裁实施的迟缓以及从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替代进口,意大利并未经历原料供应紧张。因此,墨索里尼轻蔑地坦言:“制裁的直接影响感觉不到。”^⑤ 在此背景下,意大利进一步突破《日内瓦公约》的限制,从 1935 年 12 月开始在战争中使用毒气以加速侵略战争。最终在 1936 年 5 月 2 日,埃塞俄比亚国王逃离本国,5 月 9 日意大利宣布吞并埃国,7 月在英法提议下国联撤销对意的经济制裁,11 月 1 日德意签订轴心国盟约。^⑥

^① Davis Richard, “Mesentente Cordiale: The Failure of the Anglo-French Alliance. Anglo-French Relations During the Ethiopian and Rhineland Crises, 1934—1936,”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 23, No. 4, 1993, pp. 513-527.

^② 周希奋、周耀明:《1935—1936 年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英、法的绥靖政策》,第 53 页。

^③ 乔纳森·科什纳著、李巍译:《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第 246—252 页。

^④ M. J. Bonn, “How Sanctions Failed,” *Foreign Affairs*, Vol. 15, No. 2, 1937, pp. 350-361.

^⑤ 周希奋、周耀明:《1935—1936 年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英、法的绥靖政策》,第 51 页。

^⑥ 陈祥超:《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始末》,第 45—55 页。

(二) 美国经济制裁与珍珠港事件

以1931年发动侵华“九一八事变”为标志,日本逐步走向了全面的修正主义道路。1937年7月7日,日本正式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还将侵略兵锋指向了东南亚地区。不仅在1940年6月施压法国允许自身进入该地区,并于9月派兵正式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切断了对华重要援助通道滇缅公路,还于1941年7月入侵了印度支那南部。^①在推进侵华战争的过程中,日本推出了具有排他性、剥削性的东亚秩序建设方案。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Konoe Fumimaro)发表声明,指出“门户开放”政策已不适用于中国;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Yosuke Mastuoka)正式提出日本要在东亚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暗示秩序范围将涵盖处在英国、荷兰等殖民地势力范围内的东南亚。^②

面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威胁,美国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多个方面采取了应对措施,其中逐步升级的经济制裁是美国制衡日本的重要手段之一。1938年6月美国政府发布“道义禁运”号召,建议本国企业不要向日本出口飞机以及飞机零部件等具有军事潜能的器械。1939年2月美国对日本停止了一切信贷;7月,为提醒日本认清对美经济依赖的现实并注意其在华行为,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宣布于1911年同日本签订的《美日贸易协定》将不再续约,并在1940年1月正式废除了该协定;随后罗斯福要求进一步削减对日贸易,对此美国钢铁公司、美铝公司取消了正在进行的对日贸易,从而阻断了大部分美国对日本的铝供应。^③1940年7月2日,罗斯福通过签署《国防行政法》,从国会获得了禁止出口一切具有军事重要物质的权限;随后在7月26日罗斯福发布声明,禁止向日本出口第一号高浓度的废钢铁、航空发动机润滑油和燃料;接着在1940年9月

^① 史桂芳:《从华盛顿体系到东亚新秩序——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演进》,载《抗战史料研究》,2015年第2辑,第31—32页。

^② 刘世龙:《日本军国主义与太平洋战争》,载《日本学刊》,2005年第4期,第152—158页。

^③ W.拉夫伯尔著、史方正译:《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0—250页。

26 日罗斯福再次发布命令,禁止美国向除西半球国家与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出口一切等级的废钢铁,彻底对日本关上了出口废钢铁的大门。^① 1941 年 7 月 26 日,依据此前一天罗斯福签署的 8832 号行政令,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本石油出口实行许可制;^②接着在 1941 年 7 月 27 日荷兰也宣布冻结日本在荷资产,且于第二天宣布废除同日本在 1940 年 11 月签订的石油供给协定并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随后英国也宣布在英联邦与殖民地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此外美英荷三国还积极收购中立国的全部或部分石油,使日本基本失去了石油进口渠道;在 1941 年 8 月 1 日,美国再次收紧对日本经济制裁的“绳索”,宣布除棉花与粮食外禁止对日本的一切出口,由于欧战已切断了欧洲对日本的出口,因此该措施等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日本实施了贸易禁运。^③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且缺乏自然资源,所需重要资源基本依赖外部进口。随着东亚侵略战争的逐步推进,日本对外部资源的需求与依赖度也在不断攀升。1937 年日本 84% 的生铁、55% 的废铁需要进口,到 1941 年日本 90% 的石油与钢铁以及 100% 的棉花、羊毛和橡胶都需要进口。^④ 美英荷是日本所需进口资源的主要供应国。1931—1937 年日本对美国废钢、废铁的进口依赖度从 16% 提升至 67%,1937—1940 年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 53.7 万吨石油,对美国石油的进口依赖度从 1935 年的 67% 升至 1940 年 90% 左右。^⑤ 正是意识到日本对欧美国家较高的经济依赖度,伊藤博文(Itō Hirobumi)早在 1906 年就告诫日本政治精英,“出于经济原因,日本需要持续赢得英国和美国的欢心与同情。”^⑥ 在 1931 年准备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也清晰地认识到,“假如先进工业国家将经济政策转向禁止或限制对我国出口原料,我国

^① 李京原:《冻结资产与石油禁运——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第 20 页。

^② W. 拉夫伯尔著、史方正译:《创造新日本:1853 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第 247 页。

^③ 李京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从拒绝实施“中立法”到废铁禁运》,载《南都论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1 年第 6 期,第 33—37 页。

^④ Daniel McCormack and Henry Pascoe, “Sanctions and Preventive War,” p. 31.

^⑤ Barnhart Michael,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194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1.

^⑥ W. 拉夫伯尔著、史方正译:《创造新日本:1853 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第 106 页。

将深受打击”。^① 所以,美国单独以及联合英荷等国实施的经济制裁给日本造成了较大消极影响,致使日本将其视作“除战争之外最有效的制裁,同时也是最有力的报复”。^②

首先,制裁削弱了日本的购买力。1937年由于原料价格上涨,日本的进口成本增加了37%,到1938年日本一半的黄金储备都用在了支付原料进口费用上,美英荷实施的资产冻结则进一步恶化了日本的购买力,对此《纽约时报》在1941年7月26日发表评论,将资产冻结视作对日本“除战争外最严厉的打击”。^③ 其次,制裁弱化了日本经济与军事实力。在1938年遭受“道义禁运”后,日本经济学家就意识到,对华战争使日本越来越难以从西方进口工业化所需的商品,特别是石油和机械工具。1940年秋日本企划院预估石油禁运会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无法承受。当禁运实施后,日本军方在1941年8月提供的评估报告认为,如无石油进口,即使在不开展任何军事行动下,现有石油储备也最多只够使用两年。除石油之外的原料禁运也使日本感受到了痛苦。在1941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海军参谋长永野修身(Nagano Osami)直言:“帝国正失去原料,也就是说我们正变得虚弱……将无法生存。”^④ 在1941年9月8日的御前会议上,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Teiichi Suzuki)指出,日本以贸易立国,重要商品都需要进口,英美的制裁正在削弱日本国力,威胁到帝国生存。随后,在10月27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各方认为制裁将会使日本在1942年底前耗尽一切储备。^⑤

美国经济制裁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使日本面临抉择:“或者与美国达成妥协,或者走向战争。”^⑥ 对此,在1941年9月6日的联络会议上,永野修身指

① 戴尔·科普兰著、金宝译:《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183页。

② 实松让著、张焕利等译:《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

③ 李京原:《冻结资产与石油禁运——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第18页。

④ 戴尔·科普兰著、金宝译:《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213、242和248页。

⑤ 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6.

⑥ Donald J. Friedman, *The Road from Iso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885.

出,面对美国的经济施压,“外交是首选,战争则是逼不得已的最后选择”^①。在两天后举行的御前会议上,日本首相近卫文麿(Konoe Fumimaro)也强调,首先要和美国进行外交谈判,而“如果外交措施无法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有利结果……就只能以终极手段保卫自己”。^②

1941年4—11月,日美两国进行了三轮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美方试图在经济制裁的“大棒”下要求日本尊重太平洋地区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支持平等(门户开放)并用和平手段改变现状。在这些原则性的要求下,美方的一个主要关切是:要求日本“以有利于己的方式解决‘中国事件’”。^③在5—6月的第一次谈判中,美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要求日本远离德国、离开中国并恢复门户开放。在8月17日的第二次谈判上,罗斯福要求日本维护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从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撤军,否则美国会动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和平,而如果日本听从要求的话美国将会满足日本的经济需求。在9—11月的第三次谈判中,中国问题依然占据重要位置。^④10月2日赫尔对日本谈判代表直言:“日军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将是展现日本和平意愿的最佳方式。”10月中旬,赫尔在谈判中抱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制造了大量垄断,拥有大量特权和利益……这或许是日本希望保持在中国驻军的主要原因。”当日本谈判代表抱怨美国在谈判中过于关注中国问题后,美方代表回答“这一问题就像问《哈姆雷特》一剧中能否不要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形象”。在11月26日赫尔向日本提交的最后一份谈判清单中,美方再次强调日本若想重建对美贸易并获得石油等物资,就必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一切陆军、空军、海军和警察力量”。^⑤

即使面临着较大的制裁压力,日本从自身考量出发也不愿按美方要求停止侵华战争。第一,对美国经济制裁可调节性的评估。对美国意图的威

^① Scott D. Sagan,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1988, p. 909.

^② 戴尔·科普兰著、金宝译:《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252页。

^③ Bruce M. Russett, “Pearl Harbor: Deterrence Theory and Decision Theor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 No. 2, 1967, p. 97.

^④ 吴荣宣:《论1941年美日谈判》,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1期,第38—49页。

^⑤ W. 拉夫伯尔著、史方正译:《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第251、254页。

胁认知使日本认为即使妥协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对自己的制裁施压,甚至还会进一步胁迫自己。作为获取了较多利益的一战战胜国,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奉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积极接触的“协调外交”。^①而随着美国逐渐将日本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制衡对象,限制日本的海军与地缘扩张,两国在太平洋地区权势追逐的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日本对美国充满了不信任的威胁认知。军国主义团体挟持日本国内政治后,大力宣传对外扩张有利、面临紧迫外部威胁等“帝国迷思”,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威胁认知。^②石原莞尔(Ishihara Kanji)在1927年就预测日美两国在三十年内必定发生战争,他在1931年发表的《满蒙问题之我见》一文中强调“我国必须在北拒俄国入侵的同时,南抗美英海军力量”。^③在1940年7月发布的《关于时局处理纲要提案》中,日本声称“对美开战为不可避免之举”。^④对美国意图的威胁认知,使日本倾向于从敌对视角看待美国对自身所施加的经济制裁。在1941年12月1日举行的联络会上,日本执政者认为美国施加的制裁压力“不仅侵犯了帝国的尊严使其无法获取对华战争的战果,还威胁到帝国生存。”^⑤在此种敌对认知的作用下,日本担忧向美国让步只会使其“得寸进尺”地威胁、敲诈自己。东条英机(Hideki Tojo)直言:“任何向美方做出的让步只会使其对日本变得更加傲慢与专横。”^⑥1941年9月8日,东条对劝其放弃与美敌对的东久迩宫稔彦(Nishihiko Higashima)亲王坦言:“英美一旦打完德国后,一定会袭击日本。”^⑦近卫文麿坦言:“一旦按美国要求做出让步,它将会依据自身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向我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从而使日本帝国匍匐于其脚下。”^⑧

① 陈月娥:《原敬与国际协调外交》,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

②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第130页。

③ 毕世鸿:《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④ 刘世龙:《日本军国主义与太平洋战争》,第154页。

⑤ Scott D. Sagan,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p. 919.

⑥ Ibid. , p. 910.

⑦ 堀田江里著、马文博译:《日本大败局: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⑧ Charles A.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37.

第二,成本收益分析。尽管美国的经济制裁给日本制造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而且1940年5月日本海军的图上战争推演也预估,一旦与美开战超过一年日本就会面临失败的风险,^①但日本认为向美国妥协自己要承受更高的损失。一方面,日本认为向美国让步将威胁自身战略安全。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自身安全环境认知所持的零和视角使其将美国、苏联与中国视作潜在安全威胁,并做出了通过构建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来予以应对的战略构想。走向全面的修正主义道路后,日本在1936年8月发布了《国策基准》《外交指针》两份政策指南,明确将保持在亚洲大陆的主导地位、向南扩张视作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事项。在日本的战略构想中拿下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所蕴含的经济资源与发展潜力有利于日本“在未来对俄、对英和对美战争中能保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②日本军事专家也叫嚣称,“为了准备与美国的战争……我们必须控制东北当局”。^③日本政府在1940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中明确了要利用一切手段使中国屈服并保持在华长期驻兵的战略目标。在日本的战略构想中拿下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所蕴含的经济资源与发展潜力有利于日本“在未来对俄、对英和对美战争中能保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②日本军事专家也叫嚣称,“为了准备与美国的战争……我们必须控制东北当局”。^③日本政府在1940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中明确了要利用一切手段使中国屈服并保持在华长期驻兵的战略目标。在1941年10月14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东条英机认为撤出中国将会危及“朝鲜”与“满洲”,对此决不能允许美国在对华问题上“说三道四”。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则一直鼓吹“满蒙生命线论”,认为一旦听从美国要求从这些地方撤出将会危及日本的生存。^④

另一方面,日本认为从中国撤出会引发巨大损失。经济上,以东三省为例。当经济大萧条、欧洲战争导致世界市场逐渐走向封闭后,日本对外贸易下降了43%,作为拥有3千万人口的中国东北则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出口与投资市场。中国东北蕴藏着的丰富的煤、木材、石油、铁矿资源,为资源不足的日本提供了供应来源。^⑤中国东北还是日本移民的主要场所。在1937年日本计划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500万人口。1931—1945年有50万

① Charles A.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pp. 339-342.

②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第125页。

③ 戴尔·科普兰著、金宝译:《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195页。

④ 伊恩·布鲁玛著、倪韬译:《创造日本:1853—1964》,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3页。

⑤ W.拉夫伯尔著、史方正译:《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第204—205页。

日本人移民至中国东北。^① 在政治上,日本认为,中国是日本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关键组成部分,一旦从中国撤出就等于秩序建设宣告失败,日本将为此要承担较大的声誉与物质损失,因此近卫文麿强调“不能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无法忍受的。”^②军事上,为制服中国,日本在关外和关内地区分别投入了70万和105万左右的陆军兵力,他们的收益与地位都紧密地同侵华战争捆绑在了一起,在日本领导者看来“撤离中国与陆军尊严不符”。^③ 在上述规避损失的认知作用下,日本将美国的要求视为“不但要放弃经多年努力所获得的利益,还要自降大国身份,这无异于国家自杀”。^④

第三,国内所存在的强硬的不妥协氛围,使得日本领导者不敢轻易对美让步。在国内有关利益集团的煽动下,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已逐渐演变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国内弥漫着对战争的狂热,对西方列强的不妥协氛围,对帝国追求的痴狂。^⑤ 一旦出现被视作向西方列强让步的举措,狂热分子不惜借用暴力手段来惩罚政府领导者,如发生在1932年5月15日以及1936年2月26日的事变。^⑥ 在此种国内政治氛围的影响下,“东条英机和他的政权不是将征服亚洲视作其个人野心的达成,而是将其视为政权生存的问题”。^⑦ 日本执政者认为,按美国要求撤出中国,不仅意味着要放弃所有已投入的资源以及获取的利益,还要“对日本的军事战略、外交政策,还有重要的国内政治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位”,^⑧而这会使“多年以来一直宣传战争和扩

① 入江昭著、吴焉译:《日美战争:1941—1945》,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3页。

② Charles A.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p. 346.

③ Scott D. Sagan,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p. 910.

④ Bruce M. Russett, “Pearl Harbor: Deterrence Theory and Decision Theory,” p. 97.

⑤ 马国川:《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327—335页。

⑥ 1932年5月15日,日本帝国海军军官、日本陆军候补生以及民间右翼分子发动对“亲西方”官员的暗杀;1936年2月26日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成员中的“统制派”与反对者进行刺杀。

⑦ 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等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1页。

⑧ 入江昭著、吴焉译:《日美战争:1941—1945》,第30页。

张政策的军队领袖们蒙羞”，也将“导致国内解体”。^①

当要在“被迫在同西方开战与帝国收缩间进行选择”^②且认为不可能调整东亚战争决策时，日本选择了通过对美开战来应对后者施加的经济制裁压力，以继续推进侵华战争。1941年8月2日，日本战争部通过了对美开战的决议，12月1日东条英机向日本天皇报告“我们帝国别无选择只能对美开战”。^③最终，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了珍珠港偷袭行动，开启了对美战争以及征服“东南亚”的侵略行动。偷袭行动当天，日本发布的对美宣战公告从侧面反映了其对此种战略冒险举动的自我认知。公告“指责”中国人“‘滥滋事端’使‘帝国俾执干戈’，美国和英国‘假和平美名以逞其称霸东洋之野心’，支持中国并‘勾结盟邦’一同采取反日政策，‘国势亦濒于危殆’”。^④

（三）美国经济制裁与苏伊士运河战争

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采取了国有化苏伊士运河的政策。对此，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英法决定用武力解决与埃及的分歧并将以色列拉入了己方阵营。当以色列在10月29日向埃及发起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英法在10月30日向双方发出停火通牒并在10月31日向埃及发动了进攻。^⑤

1956年7月31日，英国向美国暗示将会运用武力回应纳赛尔国有化苏伊士运河的决定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派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前往英国转达自己认为动武将是错误的口信。杜勒斯直言：“我们旗帜鲜明的态度是，无论哪一方开启战端，我们都将阻止冲突。”^⑥当英法开始集结军队后，艾森豪威尔写信给艾登指出：“如果英

① Bruce M. Russett, “Pearl Harbor: Deterrence Theory and Decision Theory,” p. 98.

② Charles A.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p. 300.

③ Scott D. Sagan,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pp. 894-895.

④ W. 拉夫伯尔著、史方正译：《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第259—260页。

⑤ Anthony Adamthwaite, “Sues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4, No. 3, 1988, pp. 449-464.

⑥ 刘明周：《霸权转移中的大国心态调整——以二战后英美在中东的权力交接为例》，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126页。

国人支持以色列,他们会发现我们支持埃及。”^①随后,他发表公开声明:“如果英国干预,那么将在英美两国之间制造裂痕。”^②所以,当英法攻击埃及后,美国感到十分不满。^③

美国向英法施加了多种停火压力,^④其中包括重点向英国施加“快速的经济压力”。^⑤一方面,利用英镑在战后的不稳定性以及英国对美元的需求,美国向英国施加了金融制裁。美国财政部在11月5日下令抛售了至少价值1120万美元的英镑。跟随美国所释放的信号,印度、中东石油国家也相继从伦敦提取英镑储备。法国外长直言:“联邦储备银行……是在美国政府同意和石油公司的帮助下对英国货币进行了官方干扰与破坏。”^⑥美国还拒绝了英国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提出的美元信贷请求,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阻止了英国提取属于自身的2.35亿美元储备的要求。当英国首相艾登的高级顾问巴特(R. A. Butler)向美财政部长汉弗莱(George Humphrey)求助时,后者坦承如果英国不停火美国将爱莫能助,而一旦停火美国自身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向英国提供金融帮助。^⑦另一方面,美国向英国施加了石油制裁压力。战争开始后,埃及通过凿沉船只堵塞了苏伊士运河,叙利亚也炸毁了英国经伊拉克的输油管道,这导致英国彻底失去了经苏伊士运河以及地中海进口的石油。面对英国的石油进口压力,美国既未启动于1956年7月30日成立的“中东应急委员会”机制向英国提供石油输送帮助,还告知美国石油公司在停火前政府不会向英国提供石油的决定,并协调沙特减少对英的石油供应,且拒绝英国用美国信贷在北美和南美进口石油的请求。

① 于英红:《艾森豪威尔处理苏伊士运河战争危机的经验及其对奥巴马政府的启示》,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第118页。

② David A. Nichols, *Eisenhower 1956: The President's Year of Crisis—Suez and the Brink of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p. 205.

③ 罗会均:《美国与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76—80页。

④ 胡才珍、左昌飞:《从苏伊士运河事件看英美“特殊关系”》,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15—216页。

⑤ Diane B. Kunz, *The Economic Diplomacy of the Suez Crisi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 222.

⑥ Christian Pineau, 1956, *Suez*, Paris: Robert Laffont, 1976, p. 169.

⑦ 乔纳森·科什纳著、李巍译:《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第72页。

此外,美国将对英实施石油禁运的谣言也甚嚣尘上。对此,艾森豪威尔坦言,“我认为,挑起这次行动的人应当自己去解决他们的石油问题,自己去下油锅”,^①“要达到和平与稳定的目的,就不能太快给予(他们)非常的帮助”。^②

美国的经济制裁给英国带来了较大的停火压力。首先,制裁给英国造成了实质性损伤,也使其得出继续战争将得不偿失的判断。进攻埃及之前的10月30日,英格兰银行估计战争会使英镑变得更坚挺,英国财政大臣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也乐观地估计战争不会影响英镑汇率。但战后美国所施加的一系列金融制裁严重冲击了英镑的稳定与汇率。1956年9月和10月英国外汇储备分别减少了5700万和8400万美元;到11月则骤减了2.79亿美元,占英国全部储备的15%。在美国财政部抛售英镑的当日,英国财政部估计,为保持英镑币值稳定当天就需要10亿英镑干预,战争的继续则只会进一步加大干预所需数额,这是英国所承担不了的。^③同样在1956年10月31日发动战争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英国领导人认为战争会影响自身石油进口,但仍相信美国会提供帮助。但当美国拒绝提供帮助后,英国面临着严峻的石油进口形势。麦克米兰估计,战争持续半年将会导致英国从苏伊士运河运输的石油减少300~600万吨,绕道好望角和从美洲来弥补进口缺口则会给英国带来额外的8亿美元成本,这只会进一步增加英国对暂时无法获取的美国石油和美元的依赖。^④

其次,面对经济制裁压力,英国资深要求停火的呼声也很高。发起战争当日就有选民写信要求艾登辞职。在11月4日英国爆发了大规模反战游行,要求艾登辞职。随着美国施加经济制裁压力,英国领导者也开始对战争持怀疑态度,正如某财政部官员指出的:“在白宫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英法的行动,不仅是出于道义考量,还担心行动对英美关系、英联邦以及英镑的影响。”^⑤这些国内压力使艾登坦言,在对埃战争问题上,“我不能再坚持了。我

^① 丹尼斯·耶金著、钟菲译:《石油、金钱、权力(下)》,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页。

^② 杨冬燕:《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③ Michael Graham Fry, “Decline Sanctions and the Suez Crisis, 1956—1957,”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7, No. 2, 1993, pp. 323-329.

^④ 杨冬燕:《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第170—171页。

^⑤ Anthony Adamthwaite, “Suez Revisited,” p. 457.

正在被所有人抛弃。我的忠实的同事已辞去国务大臣的职务,我不能再依靠保守党内的举党一致。坎伯雷主教、教会牧师、石油商,每一个人都在反对我”。^①

最后,英国判断美国的经济制裁是可调节的。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制裁英法时承认的那样,“世界上没人相信我们会真正断绝与英法的盟友关系”,^②处在美国经济制裁施压下的英国也认为美方针对的是自己侵略埃及的战争行为而不是自己,一旦停火美国依然会保持同自身的盟友关系并放弃对自己的经济制裁。当苏联发出派兵支持埃及并将使用核武器强制停火的信号后,美国相应地发出了将运用核武器来保护盟友的警告,这使英国确认了美国的联盟承诺,不担心停火后还会受到美国的孤立。^③

上述战略现实与政策考量最终使英国在 1956 年 11 月 6 日单方面发出了停止对埃及的军事行动的命令。失去了英国的合作,法国和以色列也先后停止了在中东的军事活动。停火后美国也履行了承诺,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向英国贷款 17 亿美元,也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英国提供 5 亿美元贷款,还从 1956 年 12 月开始向欧洲大规模输送石油。^④

五、结论

当 C 运用经济制裁施压 A 结束与 B 的战争时,为什么 A 会做出继续战争、扩大战争、结束战争三种不同反应?现有经济制裁研究过于关注制裁成功与否的条件,但缺乏将制裁失败作为因变量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探究导致不同失败类型的原因。本文提出,C 经济制裁的战力削弱度与 A 战争调整的难易度,是影响 A 会如何回应制裁施压的两个自变量。当经济制裁未削弱战力时 A 会选择继续按自身节奏推进与 B 的战争。当经济制裁削弱了

① 陈启能:《大英帝国从殖民地撤退前后》,方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7 页。

② Geoffrey Warn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ez Cri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7, No. 2, 1991, p. 315.

③ 温显娟:《论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英美关系》,载《历史教学》,2003 年第 10 期,第 50—53 页。

④ 宋伟东:《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英美“特殊关系”的变化》,载《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第 75—78 页。

A 的战力,且按 C 的要求停止战争较为容易时,A 会选择停火。当经济制裁削弱了 A 的战力,而按 C 的要求停止战争很困难时,A 会选择通过扩大战争的冒险方式来缓解制裁压力以继续推进同 B 的战争。

为应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英法虽在国联内对意大利实施了经济制裁,但因制裁合作困难等原因既未将石油纳入制裁名单,也忽略了对意大利实施金融制裁,结果经济制裁并未给意大利的战争能力带来较大消极影响,使它能继续推进战争直至吞并埃塞俄比亚。面对日本在东亚的侵略行径,美国逐步勒紧了对日本的经济制裁“绳索”,严重削弱了日本的战争实力,但因国内反对、对美国的不信任以及认为按美方要求停战会给自己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日本认为自身无法按美方要求停止在东亚的战争,最终选择了通过偷袭美国和“南进”扩张来缓解自己所面临的经济制裁压力,以继续推进在东亚的侵略战争。当 1956 年英国协同法国、以色列向埃及发动军事攻击后,美国对英国实施了金融与石油制裁,给后者施加了较大的战争成本,由于英国将继续战争框定为不合算也认为美国不会轻易抛弃自身,因此英国最终按美方要求停止了对埃及的军事行动。

文章研究具有特定理论与现实蕴含。理论上。第一,将经济制裁与战争扩散联系起来讨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分开探讨“低阶政治”与“高阶政治”相关议题的不足,有利于促进不同研究领域的折中分析。第二,研究经济制裁对战争扩散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既有研究过于笼统地讨论经济制裁的运用领域的不足,细化了关于经济制裁的运用领域的研究。第三,文章研究表明,经济强制有时会进一步引发战争扩散,这对“贸易和平论”带来了挑战,意味着军事、经济等不同的治国方略的成本是相对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四,文章研究对强制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现有强制研究假定当目标既定而继续追求目标的成本很高时被强制对象会选择放弃目标。但前文研究发现:即使在经济制裁施压的强制下面临巨大战争成本时,强制对象有时也会选择孤注一掷地扩大战争而不是放弃既有战争来缓解制裁压力。这表明只从国家单一行为体的理性视角出发还无法完全把握强制策略的实践现实,而须拓展既有相关理论假设将心理因素、国内政治等变量纳入强制研究框架。

在理论层面,未来还可从六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第一,从梳理英法

“三心二意”地制裁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行为的原因中可以发现,政治或战略考量也是影响经济制裁运用与实施以及它最终是否会削弱制裁对象战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需要将该因素纳入对影响经济制裁之伤害效能的因素的研究中去。第二,前文在论述时,潜在地固定住了C对B的支持决心,假设它会持续施加经济制裁压力来强迫A结束对B的战争。未来可以放宽该假设,讨论A对C利用制裁施压来持续支持B的决心的判断会怎样影响A的战争决策问题。第三,文章着重从演绎层面阐释“战力削弱度”“战争调整难易度”两个自变量的内涵及其作用机理,以期为相关理论检验构建一个较为清晰的评估框架。未来可以尝试对两个变量进行量化测量,看能否有效地评估出战力因制裁而严重削弱以及战争难以调整的相关阈值。第四,在讨论面对经济制裁施压下的战争决策时,文章假设A方领导者的时间视域(temporal horizon)较短,会着重考虑C方制裁给自身当下对B的战争所带来的影响,而不会关注制裁的长远效应。未来,可以讨论A方领导者时间视域的长短对其战争决策的影响。比如,可以设想,如果A拥有较长的时间视域,那么它可能会在此刻选择扩大战争来弥补或抵消制裁的长期消极后果。第五,文章指出成本收益分析、对发起制裁方意图的感知、国内政治变量,是影响制裁对象调整战争的难易度的三个必要条件,未来可以讨论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及其类型问题。第六,未来还可以继续扩展案例验证范围或借助大样本统计分析等方法来进一步检验本文所提理论假设的适用性。^①

实践上。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美国联合欧盟等向俄罗斯施加了较为全面、多轮的经济制裁,意图迫使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将如何反应?依据文章的研究框架可以预测,这取决于俄罗斯所承受的制裁压力以及它对按美西方要求停火的难易度。如果经济制裁并未给俄罗斯带来较大损伤,可以预计俄罗斯将会按自身节奏继续开展对乌的特别军事行动直至实现其所设定的战争目标。如果经济制裁给俄罗斯带来了较大消极影响可俄罗斯也不愿屈服于美西方的停火要求,这将可能会刺激俄

^① 如果想要借助大样本统计分析来研究经济制裁与战争扩散的关系,就需要相应地建构一套具有较高信度与效度的数据集。这种数据集不仅要包括经济制裁数据,还要包含战争进程的相关数据,以为相关的统计分析打基础。

罗斯铤而走险,将战火引向他处来寻求缓解经济制裁压力以继续推进对乌的作战。而如果在承担巨大的经济制裁压力的同时俄罗斯也愿意听从美西方的停火要求,那么俄罗斯将会停止对乌的特别军事行动。从目前来看,尽管面临着美西方较大强度与广度的经济制裁施压,但得益于自身超大的国土规模与丰富的资源储备、克里米亚危机后的经济主权堡垒建设努力、国内生产替代以及努力开拓同印度、伊朗等第三方的外贸等,美西方的经济制裁虽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未严重削弱它的战力,俄罗斯依然坚持要实现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随着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强化“以台制华”的同时也运用经济制裁威胁威慑中国不要改变所谓的“台海现状”。对此,可以设想两种战略情景。第一,在美国经济制裁的威慑信号为真的情况下,如果台湾将来突破“一个中国”底线而中国选择采用强力措施来维护祖国统一,那么现时中国该如何规避可能来自美国将来的经济制裁压力?依据本文的研究框架,这要求中国强化经济韧性,避免对美国等形成脆弱性经济相互依赖,以防在台海发生突发情况下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第二,即使将来中国选择强力打击“台独”分子面临美国巨大的经济制裁压力,鉴于台湾在中国国家利益构成中的核心重要性以及中国内部对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度政治共识,中国很可能不会轻易屈服于外界的经济制裁压力。不管是俄乌冲突的现实还是“台海”的情境假设都表明,鉴于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现实、各国对自身所看重的核心利益的坚定捍卫立场、大国间出现的“互信赤字”以及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美国需克制频繁地将经济武器化的战略冲动以免引发战略意外。